

当代资本主义“零工经济”对阶级构成的影响探析

黄浩宇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要

数字时代的资本积累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 零工经济的崛起标志着资本增殖向数字空间的全面扩张。文章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 剖析了资本如何利用算法规制与平台中介, 将碎片化的私人资源纳入高频积累回路, 从而实现劳动力商品与生产条件的极端化剥离。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场域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的尖锐冲突, 剩余价值加速向垄断平台转移。面对这一困境, 唯有突破私有制外壳, 确立“不在线权”等新型数字劳动权利, 并构建社会化的权益保障体系, 方能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制度超越, 找回劳动主体价值。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零工经济, 阶级构成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Gig Economy” und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n Class Structure

Haoyu Hu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ne 27, 2026; accepted: July 19,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 marks the comprehensive expansion of capital appreci-

ation into the digital space.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alyzes how capital, through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nd platform intermediation, incorporates fragmented private resources into high-frequency accumulation circuits, thereby achieving an extreme separation of labor power as a commodity from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s manifested in the digital field as a sharp conflict between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ivate appropriation of digital means of production, with surplus value accelerating its transfer to monopolistic platforms. In the face of this predicament,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shell of private ownership, establishing new digital labor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be offline”, and constructing a socialized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can we achieve an institutional transcendence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reclaim the subject dignity of living labor.

Keywor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Gig Economy, Class Composi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数字化转型的深化促进了资本积累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网络的转移。作为这一转变的前沿，零工经济利用算法控制与平台中介的紧密结合，在重构生产力的同时掩盖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在这种灵活积累的模式下，资本超越了工厂的地理位置制约，将在这之前处于市场领域之外的碎片化时间和个人资产纳入价值增殖的道路。这一过程通过“随用随弃”的机制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转变。可是，技术赋予的自由表象掩盖了算法黑箱对主体性的深度实时控制，以及劳资双方之间悬殊的权力失衡。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震荡导致传统工人阶级集体反抗力量的逐渐削弱，催生了一个以碎片化劳动和缺乏社会保障为特征的“不稳定无产者”阶层。阶级冲突向社会再生产领域的这种扩散表明，小修小补的法律调整不足以解决数字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一现象代表了新技术条件下生产社会化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通过分析阶级架构的动态演变，我们可以揭示数字平台榨取剩余价值的隐蔽机制，并为建立劳动者权利的新范式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超越提供理论基础。

2. 灵活积累：零工经济作为资本增殖的新场域

要分析阶级架构的深刻演变，就要首先考察生产方式前端的结构性波动。零工经济绝非传统市场的温和补充，而是资本增殖中一个具有高度扩张性的新方式。它摆脱了“共享经济”的假象，将私人生活中的碎片时间、物理空间以及个人资产整合进高频、高压的积累回路。在这种“灵活积累”模式的背后，既包含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底层逻辑的重塑，也包含平台精准算法对劳动力的即时提取。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使阶级边界变得日益流动且脆弱，同时促进了劳资博弈隐性动态中的结构性转变。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向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次演进，本质上都是资本为了克服积累危机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进入数字时代，零工经济的崛起标志着资本积累范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转向”，这场转向的核心，在于资本成功地将信息通信技术嵌入到了生产力的底层架构中。

这种变革最直观的表现是生产力形态的重构。数字化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工具属性，它正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渗透进经济循环的每一个角落，促使传统的实体资本经济加速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型

[1]。在这种逻辑下，生产的空间界限被彻底打破了，原本局限于工厂围墙内的价值创造过程，开始沿着数字网络的细微脉络向整个社会弥散。

随着这种转型的深入，数据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代资本增殖的核心。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形成了数字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资本通过对数据的持续收集、分析与加工，将其转化为具有经济收益的“数据-流量”[2]。这意味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发生了一次隐秘的跃迁：它不再仅仅盯着物质产品的占有，而是转向了对数字空间内活劳动轨迹的实时捕捉。

作为这种转向的制度承载，零工经济为资本提供了一条更为隐秘的积累路径。零工经济实质上是数字平台支撑下的新型资本积累形式，它利用算法规制和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赋予了资本积累过程前所未有的隐蔽性[3]。资本不再需要通过显性的雇佣契约来维持统治，它只需隐身于算法之后，通过控制数字流量就能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灵活积累”。本质上，这场数字化转向是资本逻辑在数字空间的全面扩张，它在赋予劳动“灵活”外衣的同时，也为资本开辟了更为广阔且难以察觉的增殖场域。

(二) 平台中介与劳动力商品的极端化剥离

在数字化转向的基础上，资本进一步通过平台中介重塑了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与使用过程。这种重构不仅改变了劳动的物理形态，更在底层逻辑上实现了劳动力商品与生产条件的极端化剥离。

这种剥离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空前扩张。零工劳动极大地扩展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范围，它将原本处于非市场领域的碎片化时间与闲置技能强制性地拉入价值增殖链条[4]。在这种逻辑下，劳动呈现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资本不再需要维持长期的雇佣契约，只需在特定瞬间购买劳动力的某个片段，从而实现了劳动力商品“随用随弃”的灵活利用。

然而，平台中介的作用远不止于简单的资源匹配，它正在构建一种新型的价值摄取模式。尼尔斯·范·杜恩等人提出了“双重价值生产”的概念，揭示了平台如何在劳动力提供服务的现实过程之外，通过所谓的“数据征收”攫取资产[5]。这意味着劳动者在为资本创造传统剩余价值的同时，还被迫无偿产出大量行为数据，这些数据作为生产资料被平台掠夺。

这种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隐形控制，最终指向了大资本对零工资产的深度吸纳。虽然劳动者看似拥有车辆、手机等自有资产，但这些资产只有在平台资本的控制下才能转化为运动中的资本[6]。本质上，资本、劳动与产品在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逐利的内在本质，它只是通过技术中介遮蔽了资本对活劳动和生产工具的实质性支配。通过这种极端化的剥离，平台资本成功地将自身包装成中立的“中介”，实则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劳动力剩余价值与数据价值的双重收割。

3. 算法规制：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双重异化

如果说“去雇主化”代表了对传统雇佣关系的解构，旨在规避法律责任与制度成本，从而实现了宏观层面的身份脱离；那么算法黑箱则标志着资本权力向微观生产领域的深度渗透。这种渗透不仅填补了因刚性管理缺位而留下的监控真空，还利用数据算法的不可见性，使剥削从契约形式转向隐匿状态。在掩盖实质隶属关系的基础上，资本进一步利用技术逻辑消解劳动者的主体性，将控制从外部的法律约束转化为内在的实时规制。

(一) “去雇主化”掩盖下的实质隶属关系

在零工经济的叙事中，资本往往通过“去雇主化”的修辞，将传统的劳资对立转化为平等的民事合作。这种表象的背后，实则是资本控制权由显性向隐性的深度迁徙。这种关系的变迁首先冲击了既有的法律规范。零工劳动极大地解构了传统的“雇主-雇员”二元关系，由于身为“用户”的劳动者并未与用工方订立明确的合同，传统的劳动法基础正在发生严重动摇[7]。资本通过模糊隶属关系，成功地逃避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用工成本，使劳动者在法律视野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然而，法律身份的“模糊化”并未削弱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实质支配，反而催生了更为严密的隶属形态。“新劳动二重性”理论认为劳动关系的真相往往隐藏在被遮蔽的劳动过程之中；当骑手在数字世界中进行数据生产而非仅仅提供现实服务时，其与平台之间构成的本质上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8]。这种观点戳穿了平台仅作为“中介”的谎言，揭示了活劳动对数字生产资料的深度依附。

随着技术逻辑的介入，传统的人格从属正演变成为一种更为隐蔽的经济支配。在任务化用工的模式下，一种新型的“经济从属性”正在替代传统的人格从属性[9]。在这种结构中，虽然劳动者在形式上保留了自由接单的权利，但算法中嵌入的生存压力与分配机制迫使他们必须顺从平台逻辑以获取基本报酬。从本质上看，这种所谓的“去雇主化”仅仅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局部幻象。它在形式上解构了刚性的管理制度，却利用数据契约与经济必然性构建了一套比工厂围墙更牢固的隶属体系，将劳动力有效地困陷于精密的算法网中。

(二) 算法黑箱对劳动主体性的实时剥削

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算法已超越了单纯的生产力工具，演变成为一种对活劳动进行实时规制与价值榨取的权力装置。这种通过数字化“黑箱”运作的独特机制，将劳动者的主体性在精密的计算模型之中消解，促使剥削形态转变。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资本对劳动者自主权的实质性剥夺。数字资本为零工经济披上了“自由化”的外衣，然而在所谓的时间自主权背后，算法干预和数字泰勒主义通过精密的评价体系与惩戒机制，实际上造成了劳动者“自由地剥夺”与过度劳动[10]。劳动者似乎在自主选择工作，实则被迫卷入了一场由算法诱导的无止境竞争。

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资本进一步利用零工经济的碎片化特征来掩盖剥削的本质。零工经济并未减轻资本主义生产中固有的压迫，反而演变为剥削的一种新表现形式；它利用劳动的原子化特征，将剩余价值的榨取延伸至劳动者生活的每一个缝隙[11]。在这种实时剥削机制下，劳动的界限变得模糊，资本得以在不支付固定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对活劳动价值的极限攫取。

这种技术权力的滥用最终确立了资本对劳动者的结构霸权。数字资本通过技术垄断建立起一套全方位的监控与分配体系，这种霸权不仅导致了劳动者经济上的贫困，更引发了深刻的精神贫困与心理异化[12]。当劳动者沦为算法指令的执行末端，其作为生产主体的创造力与尊严被彻底数字化，主体性在算法黑箱的实时计算中被损耗殆尽。算法黑箱构建了一套去人性化的管理逻辑。它将鲜活的劳动过程还原为冰冷的数据流量，在追求增殖速度的同时，切断了劳动者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使之成为被数字逻辑实时支配的“活的机器零件”。

4. 结构重组：劳动者碎片化与“不稳定无产者”的兴起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生产方式与劳动过程的重构必然导致阶级架构的深刻重构。如果说算法规制实现了资本对劳动控制权的微观占有，那么这种权力的弥散则在宏观层面引发了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集体转向。这种转向最直观的后果是，传统工人阶级基于工厂协作的集体力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在算法缝隙中生存的、模糊的“不稳定无产者”群体。通过数字契约将劳动力拆解为离散的孤岛，资本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制造了劳动的碎片化，还从认同逻辑与分配机制上，将阶级之间的矛盾推向了一种更为泛化且隐蔽的对抗状态。

(一) 传统工人阶级集体力量的削弱

在资本逻辑的数字扩张中，生产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不仅重塑了劳动过程，更从根基上瓦解了传统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基础。这种力量的削弱并非偶然，而是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对劳动关系进行解构与重组的必然结果。数字经济的兴起首先在客观层面导致了劳动关系的碎片化。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使得劳动者呈现出“弱单位从属性”特征[13]。由于工作岗位的极度流动性与非

实体化的工作场景，原本聚集在工厂车间的集体劳动被分散为孤立的个体作业，这种时空上的隔离不仅切断了劳动者之间的物理联系，更直接导致了劳动关系趋于个体化与碎片化，使传统的集体协商机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如果说空间的分散是物理层面的阻隔，那么平台资本对身份认同的重构则是从心理维度对阶级意识的消解。平台资本主义通过算法机制建构了多元的身份叙事，这种“身份政治”的共谋淡化了阶级认知，导致无产阶级阶级认同的模糊与革命主体性的丧失[14]。当劳动者被包裹在平台塑造的“合作伙伴”或“独立承包商”的幻象中时，他们很难再从阶级对立的视角去审视自身的处境，资方成功地将阶级之间的矛盾隐藏在多元身份之中。

与此同时，这种集体力量的削弱还伴随着劳动者职业议价能力的弱化。零工经济对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虹吸效应”，并随之带来了严峻的“去技能化”陷阱[15]。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入缺乏技术门槛的平台业态，劳动者原本积累的专业技能在简化、机械的算法指令下逐渐枯竭，这不仅使个体陷入职业发展的死胡同，更让整个群体因失去多元职业技能而丧失面对资本时的博弈筹码。这种集体力量的削弱是资本权力对活劳动的一次“分而治之”。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劳动者从物理空间到阶级意识，再到技能素质的全方位拆解，从而在碎片化的劳动图景中确立了无可挑战的结构性优势。

(二) “不稳定无产者”的阶层特征与生存困境

随着传统劳动保障体制的消解，零工经济催生了一个庞大且面目模糊的群体——“不稳定无产者”。这一阶层的兴起并非简单的职业更替，而是资本在数字金融化时代对劳动力进行结构性排斥与再吸纳的产物。

从阶级属性的深层逻辑来看，这一群体呈现出极强的边缘性与被动性。“不稳定无产者”本质上并非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新阶级，而是资本金融化背景下处于失权状态的劳动力后备军[16]。资本通过灵活就业的契约形式，既维持了对这部分劳动力的随时调用，又成功剥离了与其相关的再生产责任，使劳动者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生存风险。

这种结构性的失权在微观心理层面引发了深刻的异化。发达社会中的“不稳定无产者”普遍陷入了焦虑与未来预期丧失的泥潭，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认同感和安全感，心理状态呈现出严重的异化倾向[17]。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纽带和晋升路径，劳动者的自我价值被碎片化的接单任务所肢解，其生存状态往往徘徊在就业与失业、希望与绝望的模糊地带。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生存困境往往伴随着技术层面的倒退。以服务业零工为例：在智能化与无人化趋势的挤压下，劳动者正逐渐沦为机器和算法的辅助工具，其主观能动性被标准化的数字指令所取代[18]。在这种技术霸权下，劳动者不仅在经济上被贫困化，更在生产实践中被剥夺了技能积累的可能性，陷入了职业生涯的“逐底竞争”。“不稳定无产者”的兴起是资本逻辑对活劳动进行的最后一次收割。它通过技术手段将活生生的个体还原为离散的成本单位，在制造出表面上的“就业繁荣”的同时，也将劳动者推向了尊严与保障双重匮乏的生存死角，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架构中最为脆弱也最为动荡的环节。

(三) 阶级分歧的泛化与对抗形态的演变

阶级架构的重组必然引发矛盾形态的深刻更迭。在零工经济的运作体系下，劳资双方的对立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生产车间，而是随着资本逻辑的无孔不入呈现出泛化与转向的特征。这种矛盾的泛化首先体现在利益博弈的多维交织零工经济内部蕴含着自主灵活与监管升级、增加收入与剥削新形式等核心矛盾[19]。这些矛盾相互渗透，使传统的单一维权诉求演变为涉及职业发展、算法歧视以及分配公平等多重领域的复杂博弈，展现了数字资本主义下社会冲突的弥散性特征。

随着平台大资本对产业链控制力的增强，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发生了系统性倾斜。从政治经济学的

角度来看这一利益失衡的真相在于大资本数字平台公司的高利润与零工劳动者的低收入并存，实质上是剩余价值从劳动者和中小企业向垄断平台大规模转移的结果[20]。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中，大资本利用算法垄断地位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价值榨取，使阶级分歧从显性的工资博弈转化为隐秘的系统性剥削。

更深层次的冲突隐藏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转嫁之中。资本通过零工经济这种灵活的契约形式，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再生产负担，更将本应由企业分担的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成本，全方位地向劳动者个体转嫁[21]。这种成本的社会化与利润的私有化，使阶级分歧从生产领域延伸至社会再生产领域。对抗形态的演变折射出资本对活劳动的深度侵蚀。资本通过算法遮蔽了剥削的本质，又通过成本转嫁削弱了劳动者的抗风险能力。这种矛盾的泛化并未消解阶级对立，反而因其隐蔽性和系统性，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歧在数字流量的掩盖下积蓄着更为复杂的冲突动能。

5. 分歧消解：零工经济困境的制度超越

面对零工经济席卷而来的结构性冲击，简单的改良方式已不足以应对资本逻辑在数字空间的全面深潜。零工经济表现出的多重乱象，本质上是数字生产力在倒逼陈旧的分配与保障体系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当资本利用算法将劳动者拆解为孤立的“数字游民”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一种主动的纠偏力量，试图通过重构生产资料所有制逻辑与权利保障的社会化范式，来回应这场由技术诱发的生存危机。接下来的讨论将深入分析，我们如何通过突破私有制外壳与构建权利新范式两个维度，在数字文明的进程中重新找回活劳动的主体性，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实质性超越。

（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的当代冲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时代并未消失，而是通过零工经济这一形态演化为了生产社会化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占有之间的深度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价值生产的扩张上，更集中爆发于高度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与极度封闭的资本增殖逻辑之间的断裂。当代数字平台凭借其强大的连接能力，将千家万户的劳动者编织进一张全球性的生产网络。这种生产方式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化特征。然而，作为这一网络核心的算法、数据及数字基础设施，却被大型平台企业牢牢私有占有。数字资本通过对技术权力的垄断，确立了全方位的监控与分配体系，这不仅在经济上加剧了贫困，更导致了劳动者主体性的沦丧与精神贫困。当生产过程越是依赖于社会全员的数据贡献，资本对这些数据的私有剥夺就越显得具有对抗性，形成了一种技术进步与人文倒退的怪圈。

面对这种由生产资料私有占有引发的分配扭曲与权益缺失，传统的、基于固定工厂体制的制度安排已显得捉襟见肘。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要求保护机制必须随之发生系统性跃迁。员工已从强单位从属性转向弱单位从属性，原有的“单位化”权益保障机制已经颠覆，亟需构建一种“社会化”的新型保障模式[22]。这意味着，针对零工劳动者的制度超越，不能仅停留在对个别企业的修补上，而应通过建立劳动基准账户等社会化手段，将权益保障从特定雇主手中收回，转而由全社会共同负担与统筹。这种制度上的超越，实际上是在尝试缓解数字生产力对私有制外壳的突破压力。当劳动者的生存风险被资本社会化，而生产收益被平台私有化时，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保障体系的社会化回归，才能在资本逻辑的丛林中，为不稳定的劳动者夺回基本的生存尊严与发展空间。这不仅是对零工困境的法律回应，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数字经济场域中对资本逻辑的一次主动作战。

（二）构建数字时代劳动者权利保障的新范式

在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占有之间的冲突后，制度超越的最终落脚点必须回归到对劳动者核心权利的重构。这种范式的转换要求我们从法律契约的浅层修补，转向对数字资本权力运作逻辑的深度规制，旨在夺回被算法消解的主体地位。权利保障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平台资本对阶级认知的技术遮蔽，以重塑劳动者的集体主体性。平台资本主义通过算法机制深度介入了无产阶级的身份建构；这种复杂的身份

政治与平台逻辑共谋，不仅淡化了阶级意识，更导致了革命主体性的侵蚀。因此，新范式的构建必须超越单纯的物质补偿，致力于在数字空间内还原劳动的阶级属性。通过加强新业态下的工会组织建设与集体协商机制，我们可以破解算法诱导下的个体孤立状态，使碎片化的劳动者重新获得阶级认同。

与此同时，针对算法对活劳动时空维度的极限挤压，制度创新必须确立适应数字特征的权利边界。在数字时代应明确确立“不在线权”和“个人数据权”，并坚持将人格尊严优先原则贯穿于算法治理的全过程。^[23]这一主张直指资本逻辑对休息时间与个人隐私的无偿占有，要求通过技术正义与法律刚性的双重约束，将劳动者从“全时空待命”的数字枷锁中解放出来。

数字时代劳动权利保障的新范式，是对资本逻辑的一次深层纠偏。它要求国家权力主动介入算法黑箱，通过确立数据主权与时间自主权，在技术理性的冰冷计算中注入人文关怀与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技术进步不再以牺牲劳动者的主体性为代价，从而在数字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实现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6. 结语

当代“零工经济”不仅是技术工具的迭代，更是数字生态下资本积累范式的深刻重塑。通过“去雇主化”的修辞与算法黑箱的隐蔽性，资本成功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实时规制，在摆脱劳动力再生产责任的同时，将传统工人阶级解构为离散、孤立的“不稳定无产者”。尽管这种变革在形式上赋予了劳动某种“灵活性”的假象，但其实质是通过数据征收与系统性剥削，进一步加剧了剩余价值向垄断平台的集中。然而，生产社会化的不可逆转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占有之间的内在张力，注定将指引劳动者从算法诱导的孤岛走向新的阶级自觉。展望未来，制度超越的关键在于突破资本逻辑的丛林，通过确立“不在线权”等数字劳动权利，将技术进步的红利从私有增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随着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与人文关怀深度嵌入算法治理，数字技术终将摆脱剥削装置的角色，转而成为促进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产性力量，在技术正义的重构中找回劳动主体价值。

参考文献

- [1] 牛飞亮. 数字化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C]//西北工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09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西安: 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09: 160-164.
- [2] 蓝江. 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9): 76-83.
- [3] 杨卉.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零工经济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23.
- [4] 邱海平, 曾悦梅. 零工劳动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力商品化理论视角[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5): 154-171.
- [5] 尼尔斯·范·杜恩, 亚当·巴杰, 赵开开. 平台资本主义的隐秘之处: 在零工经济中攫取数据资产[J].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4(3): 100-112.
- [6] 闫境华. 零工经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三重关系分析[J]. 改革与战略, 2021, 37(10): 11-19.
- [7] 董成惠. 零工劳动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解构以及应对措施[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5): 100-111.
- [8] 陈龙. 两个世界与双重身份——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22, 37(6): 81-100+228.
- [9] 武辉芳, 谷永超. 我国零工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9): 85-91.
- [10] 严宇琨, 龚晓莺. 零工经济劳动自由剥夺的实质及应对[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12): 71-79.
- [11] 邓雪, 张春霞.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零工经济的特征与影响[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9(5): 9-16.
- [12] 王曰影. 零工经济视域下新型劳动关系探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2(5): 53-56+133.
- [13] 马璇. 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的碎片化与隐性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1): 61-74.

- [14] 雷禹, 郭盛钧. 论平台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身份认同危机[J/OL].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3.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586.C.20251121.1341.002>, 2026-03-03.
- [15] 闻效仪. 去技能化陷阱: 警惕零工经济对制造业的结构性风险[J]. 探索与争鸣, 2020(11): 150-159+180.
- [16] 苏熠慧, 姚建华. “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 [J]. 中国图书评论, 2020(8): 45-52.
- [17] 梁燕城. 发达社会中的贫困阶层: 不稳定无产阶级[J]. 北京规划建设, 2021(1): 196-200.
- [18] 陈龙, 赵磊. 当劳之急: 服务业零工经济的“去技能化” [J]. 文化纵横, 2022(1): 79-86+159.
- [19] 吕翠. 零工经济研究中的矛盾梳理及未来研究展望[J]. 商业经济, 2021(8): 108-109.
- [20] 闫境华, 石先梅. 零工经济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理论月刊, 2021(8): 35-43.
- [21] 许佛平, 景维民. 数字经济下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新变化——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当代经济研究, 2025(8): 49-60.
- [22] 李海舰, 赵丽. 数字经济时代大型平台企业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J]. 改革, 2023(1): 95-108.
- [23] 朱晓峰. 数字时代劳动者权利保护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0(1): 37-55.